

## 营口史话

## 营口近代经济的特点(上)

史事  
钩沉

于卓民



太古码头及大屋子

营口是座港口城市,是晚清时期东北三省市场经济的首发地、商品经济的集中地、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地。因而,营口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,成为东三省之冠,并非常具有特点。正因为如此,营口成为东三省市场交易中心和金融活动中心。

## 一、近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企业——“大屋子”

“大屋子”是东三省市场经济中营口所独有的商贸企业。“大屋子”既不买货也不卖货,而是批发代理业、仓储业和为南北客商作中介的综合性商贸企业。“大屋子”备有宽大的房子(这是“大屋子”名称的由来)作为货物仓库,有宽阔的场地作为露天货场。各“大屋子”有伙计若干、

学徒若干,免费为南北客商进出仓库搬运货物。“大屋子”有专人为存货商人寻求买主或代为客户寻找欲购货源,也备有客房和伙食。所以,“大屋子”集仓储、批发代理和服务于一体。东三省的大豆、药材等土特产,通过辽河航运或陆路集中到营口,这些产品并非按签约(合同)运来的,而是先运到营口,再寻找买主。京广杂货、外来洋品亦非有了买主才运来营口,也是先把货物运来,存于某家“大屋子”,再委托“大屋子”批发出售。“大屋子”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,并随着贸易不断扩大,得以长足发展。

营口最早的“大屋子”始于清光绪二年(1876年)。兴记棧、宏利和两家“大屋

子”最先开张,其后,东盛和、西义顺、和顺义、益利泰、恒利泰、天增福、公佑兴、天和深、东生长等先后创立。到民国年间,营口有杂货“大屋子”60余家,药材“大屋子”40余家。

营口“大屋子”的经营不是一帆风顺的,时有兴衰起伏,唯独东永茂经营60余年(1887年—1948年),可谓久盛不衰。东永茂是“广东帮”的财东集资60万白银来营口兴办的,在市内有银炉、油房等联号(联东不联财,就是一个财东,分别核算),在大连、公主岭、宽城子(长春)、吉林、开原、上海和香港等地分设13家分号。东永茂有长年驻寨的(内寓),也有临时驻寨的客商。

“大屋子”的效益,是在委托买卖过程中收取“买三卖二”的佣金(5%)。营口各“大屋子”的利润十分可观,一笔100万两的交易,“大屋子”可收取5万两银的佣金。所以,营口最显著的商号都是“大屋子”,如东盛和、东永茂、西义顺等。营口最著名的商业巨子如潘达球、李序园、郝相臣等,都是“大屋子”的财东、经理,又是营口历届商会会长、总理。“大屋子”买卖货物大都发生在年关。按营口炉银制度,每年三、六、九、腊4个月初一为“卯期”(过炉银结帐之日),商人要回家过年,剩余的货物让利卖给“大屋子”。这批货物过年后,在交易旺季时,均可获较高利润。

## 二、营口近代市场经济的支柱——炉银

支付手段是市场经济活动极为重要的条件,没有钱谈何交易?营口在晚清时期,市场上流通的币种既复杂又混乱,外币有美元、英镑、法郎、卢布(羌帖)、墨西哥银元、日本金票(老头票)、银票等。这些货币在营口市场上均可流通,币值各不相同,计算起来十分不便。国内的白银更复杂,营口市场上可见的有“锦宝”“元宝”“白宝”“卫化”“松江锭”“申银”“关平银”(海关银)“官平银”(户部银),还有杂银、银饼、银块等,它们的成色(含银量)不同,重量(指一锭银的重量)不等,交易中支付时,十分不方便。

营口开港后,贸易日盛,现银来源愈多,银质愈杂。有识之士鉴于此,为免交易分歧,便于支付,遂于咸丰十一年(1861

年)由永成德率先成立营口首家银炉,将各地流入营口的各色杂银,改铸成色一致(九九二,即含银量99.2%),重量相等(五十三两半,即每锭炉银53.5两。注:官平银九九九,重五十五两,营口炉银九九二,每百两差七两,五十两差三两半,故营口炉银一锭五十三两半与官平银一锭五十两等值)。除官平银外,地方铸银称“地平银”,营口的炉银称“营平现宝”,俗称“炉银”。自“炉银”在营口市场流通后,凡外地带人营口进行交易的各种杂银,均需交某家银炉改铸后,方可在营口市场流通。“炉银”在营口市场流通80余年,对营口市场经济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营口市场交易额自开港后逐年增加,银炉业也随之兴旺发达。永成德之后,“山西帮”的东茂凝、福凝盛、晋大丰、天盛亨,“山东帮”的奉泰文、恒有为、鸿盛利、义盛德,“河北帮”的永成公、宏聚和、志发和,“广东帮”的义丰恒、东记号、东盛和,奉系的毓记和裕记等相继开业,营口银炉达到73家。

营口市场的年交易额从百余万两,逐渐提高到亿两以上,一笔交易即高达百万两之多。百万两炉银按当时16两1斤计算,其重量为3.125公斤,支付过程十分不便,运输过程非常危险。在支付过程中,常常出现甲商从A银炉提取炉银100万两支付给乙商,乙商又将100万两炉银存入A银炉的情况。A银炉于是提出一种简便办法,改进炉银流通过程,即:只过码,不动现银。营口的炉银从此进入“过炉银”时期。



## 营口肇兴轮船公司轶事

刘永春



肇兴公司提货单

近日,笔者在藏友杨新涛处发现一张营口肇兴轮船有限公司的货物提单,运输的货物是营口通发棧运往山东龙口的野蚕丝(放养的柞蚕丝)。单据上标明,野蚕丝数量26件,水脚银(水运费)若干,及双方交接货物注意事项等,并盖有肇兴公司公章二枚。单据背面英文标注各项,并印有大清国旗(龙旗)及肇兴公司旗。时间是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(1911年9月7日)。这是一件研究营口近代商业物流与海运交通的珍贵资料。

1894年5月,山东莱州府掖县商人张仁安,在营口西大街投资白银2万两,创办“通发棧”商号,以经营山东半岛牛皮为主,兼营粮食、豆类、酒类、陶瓷、茶叶、蚕丝等,是营口经营南北物资土特产的杂货大屋子。清代盖平县(今盖州市)蚕丝质好名扬海外,是当地知名特产。据相关资料记述:清初,闯关东移民来到盖平后,发现东部山区柞树成林,茂密无比,气温适宜,雨量充沛,是人工放养山蚕的好地方。于是引进优良蚕种,经过多年培育饲养,形成盖平蚕丝誉中华局面。据宣统元年(1909年)《盖平县志》载:“盖平有丝绸行33家,年产丝绸3000疋,与河南鲁山绸,山东昌邑绸齐名。”由此可见,盖平县的柞蚕丝,通过通发棧收购转售到山东龙口,是正常的商品贸易。但提单正面有英文签字,不知这批货是否与洋商有关?是否远渡重洋又销往海外?

1861年,营口开埠之后,外来洋商、洋行纷至沓来,很快占据了辽河码头,垄断了通往烟台、登州、龙口等的航线,控制了辽东湾周边市场。1909年,时任营口总商会协理(副经理)的营口巨商李恒春(字序园),联络大清银行营口支行帮办王源瀚、交通银行营口分行经理康焘、营口巨商陈子成等营口上层社会名流,商议筹办由中国人组成的海运公司,以集资100万小银元为主,分为20万股,每股5元,来吸引股民。这次集资入股,吸引了众多股民,包括一些山东妇女,也将平时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,投入到集资入股中。

1910年7月27日,公司召开股东大会。经投票选举,大清银行营口支行协理王源瀚为总董事长,交通银行营口支行经理胡俊采为副董事长,营口商务总会协理李恒春等5人为稽查董事。董事会由25人组成,成立了营口肇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。初始,公司租赁东二道街利生源旧址办公,当公司集资到15万元时,便派陈子成南下购船,开创了营口民营航运事业的先河,打破了外来洋人垄断航运的局面。

1910年8月22日,预先在香港英商船厂订购的新船“肇兴”号,披红挂彩,汽笛长鸣,驶入辽河。营口众商民冒雨到河边欢迎。8月24日,举行了营商股东登轮参观茶话会。码头长鞭如龙,万爆竹响,人潮涌动,警务局乐队奏乐助兴,好不热闹。这难见的盛况,先后被《盛京时报》连续报道。“肇兴”号由挪威人韦德门担任船长,利用大清银行营口支行码头,从事营口至龙口水运。可是,一切并不向想象的那

么美好,肇兴公司经过1年打拼,年终结帐亏损11240元,这对股民是个巨大打击,上层领导也出现了种种矛盾。王源瀚、胡俊采、陈子成等人先后退出肇兴公司,公司重担又落到原发起人李恒春肩上。

新组阁的董事会,李恒春任董事长,启用其四弟李恒瑞(字子初)为副董事长。李氏弟兄心往一块想,劲往一处使,很快使公司步入正轨,逐年盈利。1910年至1927年,肇兴公司先后以滚雪球的方式,购进肇兴、荣兴、同安、同兴、和兴、联兴等轮船,与英商太古、怡和及日本东和等洋商展开竞争。他们在业务中热心为中国人服务,客票价合理,得到社会支持,使其发展更快。1915年3月,肇兴公司选购绥定门西北辽河岸边地,修建码头、仓库、办公楼等。1922年2月,肇兴公司经过周密考察,准备在葫芦岛修建码头、仓库,进一步扩大水上运输。可是,申请报告很快被东三省巡阅使公署训令政字第十四号驳回,原来是张学良早已看好葫芦岛欲建军港。

这时的肇兴公司,已成为营口知名大公司,在买卖做大的同时,还向社会献爱心,捐款赞助红十字会救济穷人。据肇兴公司后人王淑兰老人回忆,1940年竣工的营口念佛寺在江南订制了一批铜佛像,有观世音、大肚弥勒佛、十八罗汉等,长时间无法运回,庙不能开光,从事佛事活动。后来找到肇兴公司,利用南运之机,将这批铜佛像免费运回营口,受到僧众齐赞。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在伪满州国统治下的肇兴公司完全控制在日本侵略者手中,船队被强行征用,卷入到战争中。众多船只毁于战火,只有“来兴”号见到抗战胜利。

肇兴公司从清末到民国,从军阀混战到“九一八”事变,见证了中华民族工业从成长、兴旺到衰落这一跌宕起伏的风雨历程。

(作者系营口市历史学会理事)



通发站旧址



肇兴公司旧址

## 国民党大员搞“劫收”

解放  
营口  
7

王辉

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营口后,对于“接收”事宜毫不怠慢。由于第一次进占营口的时间太短,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还没来得及“大显身手”,就被我军赶跑。再次占领了这座港口城市后,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派出“接收大员”,对营口进行全面接收。

于卓民在《营口通史》里讲到:经济部派员接收满洲制纸株式会社营口工厂(即后来的营口造纸厂),改厂名为经济部营口造纸厂,后又改名为辽宁纸浆造纸有限公司营口纸厂;又派人接收营口纺纱厂(营口纺织厂前身);交通部东北交通接收委员会派员接收电报电话局;海关接收营口关税并改为营口山海关;资源委员会东北电力局派人接收营口电业局并更名为营口电力支局;又成立营口盐务公署……国民党的接收事业一派红火。

有油水可捞或是要害部门,都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眼里的香饽饽,只顾争抢先后去“接收”,生怕晚了,肥水流走。至于如何发展生产恢复民生,他们是不考虑的,只是忙着“劫收”财物,中饱私囊。接收造纸厂的大员把用于生产的毛巾(托纸浆的毛毯),纸浆板大量外运倒卖掉,钱则装进自己的腰包;接收纺纱厂的大员将棉纱、棉布大批盗卖;接收卷烟厂的大员不仅盗卖成品,还把大桶烟叶运走卖钱,同样都将钱揣进自己的口袋。有些工厂原本奄奄一息,经此一番“接收”折腾,直接变成了空壳。

国民党军队在“接收”事业上也不甘落后,每天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去,制镁厂拆卸设备、厂房、仓库。有资料记载:据不完全统计,共盗卖各种电动机1700台、电解铜板300吨、各种机械设备200多台、轻金属板300吨、水道管材20吨、电讯器材、大小变压器和海底电缆更是难以计数,大大地发了一笔“劫收”财。后来进驻营口的国民党交警总队防区内有制镁厂,总队长李安也盯上了这块肥肉,派手下将厂内制管管道和铜电线拆卸下来后,直接运到上海高价卖出,大发横财。

其时,在营口有个国民党东北行辕驻营口物资检查站,职责是专门防止将东北物资运往关内。当时,上海奇缺钢铁和有色金属,价格很高,这个检查站虽然也扣留一些船只,却干着明目张胆的勾当,白天扣留,夜里再放行,皆因钱的神通。他们不顾一切地“劫收”,给被接收地区的工商业带来新一轮浩劫,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用“五子登科”的顺口溜画像,极其精准:“金子、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女子(汉奸的妻妾)”,是“接收大员”巧取豪夺的对象,刻画出国民党要员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的丑恶嘴脸。如此种



东北九省流通券

种恶行,不仅丧失了老百姓对国民党中央正统的信念,也为国民党统治的土崩瓦解埋下了起爆器。

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人民的死活,整日忙着“劫收”,对经济生产不管不顾,营口人民生活及其困苦。于卓民在《营口通史》里记述:据统计,高粱米在1946年2月国民党占领营口市时每斤4元1角4分,1947年1月31日每斤20元,到1947年底(营口第三次解放前夕)每斤竟达248元,通货膨胀率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当时老百姓形容,用一面袋白钱(国民党发行的“东北九省流通券”)买不来一袋高粱米。社会上流传着“想中央、盼中央,中央来了更遭殃”的民谣,此时的国民党政府,表面上看是中国的中央政府,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统治基础,走向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国民党在营口实行白色恐怖,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,形势十分险恶。我辽南地委组建了中共营口市城市工作委员会,卜昭敏为书记,主要任务是了解和掌握营口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,指导下党工作,在营口周围农村组织群众开展斗争。此后,中共营口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营口县委城市工作部,卜昭敏为部长。

“八一五”光复后,国民党为占领东北,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部,任命杜聿明为司令长官,并于9月间,在美国军舰帮助下,将其52军、13军分别由昆明和中印、中缅边境调来东北。10月下旬,占领被我收复的秦皇岛,11月12日,向被我收复的关东关进发。同时,将伪满冀东讨伐队姜鹏飞部编成新27军,空运长春、哈尔滨一带。接着,国民党新1军、新6军、71军、60军、93军、53军又先后从秦皇岛、葫芦岛登陆。至1946年6月,东北的国民党军计有正规军8个军和特种兵、保安团、交警总队等,共35万7600余人。至10月份,其正规军达36万5000人,收编土匪、保安团队12万零800人,总计为48万5800余人,气焰异常嚣张。